

十大元帅的不同结局

十、叶剑英元帅



叶剑英，广东梅县人。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前，微睁双眼，看到站在面前的叶剑英，眼睛一亮，用手臂示意叶剑英。叶剑英只顾伤心，没注意到，低头走出病房。护士忙叫他回来，毛泽东双目微睁，嘴唇翕动，却说不出来话。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叶剑英挺身而出，争取华国锋。叶剑英多次与华国锋交谈，请他放心，只要他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

叶剑英又找汪东兴谈话，在叶剑英的努力下，10月6日抓获“四人帮”。大家提议叶剑英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叶剑英说，我是军事干部，对地方不熟悉，推掉了。1980年，叶剑英被诊断为帕金森氏病。此病常常引起并发症，特别是肺部感染。1981年春，叶剑英在武汉对何长工说，中国有句俗话，叫“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离84岁还差两个月。何长工说，那你这两个月得注意点。叶剑英说，大概阎王在这两个月不会请我，我也不会主动去。两人哈哈大笑。

1982年，叶剑英的病越来越重。医疗小组认为应该输抗生素。在叶剑英生命的最后三年，数十次肺部感染，有几次特别严重，持续时间很长，使用过几十种抗生素，静脉穿刺上千次，都没有产生副作用，两肺部炎症基本消失，这在医学界是少见的。

1983年11月19日，叶剑英突发心肌梗死，抢救好转。

由于病情反复，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二号的家中卧床两年半。1984年4月19日，多次出现高烧，呼吸困难。7月仍高烧不止，呼吸困难，出现黄疸和腹水。7月16日、7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22.23号文件，向全党通报叶剑英的病情。专家妙手回春，叶剑英的病情再次好转。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叶剑英的第三次病情通报。

1986年10月13日，叶剑英昏迷，体温上升，呼吸急促，心律、血压都不正常。各种抢救措施都用上，仍没有什么效果。10月21日，病情进一步恶化。10月22日1时16分，心电图机上的波峰消失，成了一条直线。

10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央召开的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宣布了这个噩耗。各地组织悼念活动，国际上也引起巨大反响，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报道，称叶剑英是一位大战略家，在中国现代史上起过关键性的作用。

10月29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等下半旗志哀。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5000余人参加。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修改悼词，并亲自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叶剑英的一生，特别是在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贡献。

追悼会后，中央领导和家属护送灵车到八宝山火化。叶剑英的遗愿是回到50多年前在他和张太雷等领导的广州起义中牺牲的战友身边。10月31日，专机将叶剑英的骨灰送往广州，暂时安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海内外十万余人前往吊唁。

1987年10月22日，是叶剑英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广州红花岗烈士陵园举行叶剑英巨幅雕像和骨灰安放仪式。雕像座下端是邓小平题写的“叶剑英”三个大字。卧碑上刻有100多字的碑文，概括了叶剑英“为花欣作落泥红”的一生。

清明前，接他们回家

1月23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中韩双方决定将于清明节前交接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23日上午，退役军人事务部与韩国国防部在北京就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事宜进行了磋商，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会谈纪要。根据双方磋商达成的共识，韩方将于2019年4月3日向中方再次移交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双方将于4月1日在韩国共同举行装殓仪式。

中韩双方遵循人道主义原则，本着友好协商、务实合作的精神，从2014年至2018年已连续五年成功交接589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今后在韩发掘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韩国将继续移交给中国。



第一架军用无人机：“长空”一号

作为上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赵煦扎根地睡半个世纪，从烧锅炉做起，不断学习钻研，逐渐成长为我国无人机领域的权威专家，主导研制了我国第一架无人靶机“长空”一号，被誉为中国“无人靶机之父”。

彼时，我国在无人机领域只能依靠从国外进口，来满足航空武器靶场试验需求。随着国内国际形势恶化，外方撤走专家、带走资料，实行技术封锁，我国航空武器试验一度陷入困境。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李新伟说，为摆脱依赖国外进口靶机的窘迫局面，1965年3月，我国启动“长空”一号靶机的自主研制工作。由于人才匮乏、技术条件落后，研制工作举步维艰、进展迟缓。

“我那时候正下放到锅炉房锻

炼。”逆境中的赵煦，系统、扎实学习了大量与飞机有关的专业知识，并把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为后来“长空”一号研制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起步之初，除了有限的几本无人靶机操作规程外，没有其他任何参考资料。研制团队根据某型涡喷发动机安装点应力集中的特点，自行设计了一种发动机与飞机壳体连接的固定箱，把涡喷发动机牢固地连接在机壳上，彻底解决了无人机动力问题。

“当时的无人机是由母机带到空中，像‘母鸡下蛋’一样从天空投放的。”起飞，曾是困扰研制团队的最大难题。一个偶然的机会，赵煦和团队成员由一张国外小车图片激发灵感，产生了一个全新设计理念，决定用于运载无人驾驶靶机滑跑起飞的工具。

作为总体方案的设计者，赵煦对空气动力特性、结构强度、飞行性能、飞行航迹等进行了全面计算论证，带领团队利用计算机、算盘、手摇计算机等落后设备，协助飞机滑跑的起飞车终于研制成功，改变了国际上用有人机高空投放靶机的历史。

1966年12月6日，“长空”一号首飞成功，奠定了我国无人机发展的坚实基础。

作为我国独立研制的第一种大型喷气式无线电遥控高亚音速飞机，“长空”一号可供导弹打靶、防空部队训练以及采样、监控等需求。

“未来，无人作战飞机将非常广泛地应用于各国部队，成为未来战场的主导力量。”数十年后，赵煦如此评价。



三军合力，两小时解放一江山岛

1955年1月18日，解放军华东军区集团海空三军之合力，以雷霆万钧之势，对盘踞在浙东东海一江山岛的国民党军发起登陆打击，以极小代价全歼国民党守军，一举打破号称“固若金汤”的敌人陈防御体系，改变了东南沿海的斗争形势。解放军指战员在这场胜利背后付出的智慧与努力，值得我们学习、思考和借鉴。

真打实备之功。一江山岛登陆战既是华东军区跨海进攻、背水攻坚的拔点破局之战，也是我军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震慑之战。鉴于任务特殊性和情况复杂性，中央军委曾多次电令，前线指挥员要立足最艰苦、最困难的条件，多手准备。为确保最后胜利，解放军指战员把真打实备、实战实训的原则贯穿战役始终，体现到战役侦察、计划、保障、训练等方面。尽管登岛作战持续仅两小时，但我军战前准备时间长达10个多月。时任浙东前线指挥部（下称“前指”）司令员兼政委的张爱萍将军，战前亲自带领参谋人员到浙东沿海及岛屿进行实地勘察，还组织空军、海军进行侦察，派出侦察兵越海捕俘、抵近拍照，全面掌握战区地形和敌情。

在定下战役决心过程中，浙东前指对夺取制空权、制海权、部队集结、装载上船、编队航渡、突击登陆、岛上战斗、抗敌反击等阶段的作战行动进行反复研究，对后勤保障中作战物资的装载、前运，水面打捞，伤员救护、后送和协同动作等难题逐个解决。对美第7舰队介入及报复行动的可能性，我军也进行充分预想，制定应对措施。为确保训练针对性，我军重点就登岛地段的选择、登岛时间的确定等问题进行充分论证，对海、空军火力掩护，舰载火炮、舰炮伴随射击和直瞄射击等课目进行反复演练。登岛作战前夕，我军还专门在类似一江山岛的大猫山、小猫山进行三军联合登岛实兵演习，获得近似实战环境的演练经验，充分体现“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作战原则。

隐真示假之策。一江山岛战役是一场跨海登陆作战，被敌发现我登陆作战动机是大忌。正如诺曼底登陆有隐瞒登陆地点的“坚忍行动”，西西里登陆有隐藏真实目标的“肉馅行动”，大凡成功的跨海登陆战，莫不以声东击西、欺瞒敌人作为重要策略。一江山岛地势险恶、易守难攻。岛上永久性和半永久性堡垒有

154个，各种火炮51门，构成3道防御阵地、4层火力网，南北两岛独立守备，互为依托，呈犄角之势。我军首批登岛部队只有3个加强营，无法形成绝对兵力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以智取胜成为必然选择。

为切实隐蔽我作战企图，达成登陆突然性，浙东前指和各参战部队把兵力部署和火力打击灵活结合起来，打出一系列对敌欺瞒的“组合拳”。早在战前练兵活动中，我军炮兵群就对一江山、大陈、渔山、披山各岛屿之敌实施无规律炮击，打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整天躲在防炮洞里。在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战斗展开后，我轰炸机、强击机、战斗机编队时而轰炸一江山岛、大陈岛，时而攻击渔山列岛、披山岛，时而突袭港内锚泊敌舰，时而打击来犯敌机。经过一个多月无规律轰炸、炮击后，敌根本弄不清我军攻击目标到底在哪里。我登陆部队的训练在远离一江山岛、距离披山岛较近的乐清湾进行，即使被敌方发现，登陆作战的目标也容易判断为披山岛。

登陆作战发起前，敌大陈防卫司令部司令刘廉一认为，解放军炮兵、海、空军的射击、轰炸只是一种“扰乱性”的攻击。登陆前的17

日下午，我军又采取“佯动于此，实动于彼”的做法，组织航空兵对披山岛实施猛烈轰炸，歼击航空兵指挥所还多次以无线电呼叫起飞的假起飞方法，引诱敌空军远离我浙东沿海空域。17日夜间，我军组织兵力向披山岛实施大规模战役佯动，敌大陈防卫司令部据此判断，我军攻击目标为披山岛。这为真正的登陆部队提供最佳掩护。

密切协同之力。登陆一江山岛既要跨海运兵，也要海空协同、三军协同。尽管“联合作战”的概念当时还没有提出，但打赢这一仗唯有联合。为更好统合海空三军力量，华东军区区下了很多功夫。在人员配备上，突出选配具有跨军种任职经历的指挥员。前指司令员张爱萍是解放军第一任海军司令，又担任过浙江军区兼第7兵团司令员。副司令员袁凤智在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以及抗美援朝期间指挥空军作战中都有杰出表现。另一位副司令员马冠三曾任第22军参谋长和华东军区海军参谋长，浙江东矶列岛战斗时为副总指挥。这样就形成一个有丰富实战经验，能够统领三军且团结和谐、密切合作的指挥班子。

在战前训练中，前指指定陆、海、空军有

黄君珏：奋战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太行女杰

黄君珏，原名黄维祐，1912年生，湖南湘潭人。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长沙从事妇女工作。马日事变后，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她离开长沙，只身来到上海，转入上海中学学习，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后就读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在校期间，她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被选为学生会委员，曾组织领导复旦学生到南京请愿和营救被捕学生的运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黄君珏参加了远东情报局的工作。远东情报局是第三国际派驻上海的秘密情报工作机构，主要搜集国民党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各种情报。黄君珏机智勇敢，胆大心细，工作很有成效，受到情报局领导人的信任和器重。

1935年，由于叛徒出卖，该组织受到破坏。黄君珏机智地掩护另外两名同志脱险后，自己却不幸被捕，被判7年徒刑。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将黄君珏保释出狱。在党组织安排下，黄君珏回长沙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领导筹办了一所难民妇女工厂。这一工厂成了流亡妇女的避难所，也为抗日救亡作出了贡献。

1939年，黄君珏被派到太行根据地工作，先后在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华北《新华日报》社任总会计兼管委会秘书主任等职。1942年华北新华书店成立，兼任审计室主任，为华北新华书店起草制定财务管理制度和经济核算制度。为了便于工作，她将出生才三天的独生子送到老家寄养，从此孩子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发动残酷的“五月大扫荡”。3万多敌人实行所谓“铁壁合围”战术，用数十架飞机配合，作梳篦式的扫荡，妄图消灭太行山根据地。黄君珏和华北新华书店的同志在转移途中与敌遭遇，经过战斗后化整为零，分散隐蔽。

在危急时刻，黄君珏对大家说：“我们决不当俘虏。我有一支枪，三发子弹，起码打死两个鬼子。”6月2日，又有几个同志被日军发现，全部不幸牺牲。黄君珏和两个女同志隐蔽在辽县庄子岭的一个山洞里，被日军包围。狡猾的敌人不敢进洞搜索，却在洞口架柴放火，浓烟顿时弥漫了整个山洞。危急关头，黄君珏毅然冲出洞口，举枪打死两个敌人，然后飞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这一天正是她30岁的生日。

湘潭市地方史志研究学者何歌劭说：“黄君珏同志以死殉国，宁死不当俘虏，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是人民的坚强战士，家乡人民的骄傲，她用鲜血书写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



兵器知识:M4 卡宾枪

M4卡宾枪是早期卡宾枪版本M16的缩短版，获世界各国的军队及警队采用。它们全是由尤金·斯通纳开发的CAR-15发展而来，而M4的长度比M16A2型突击步枪较短，重量也较轻，两者之中有八成的部件可以共享。一些M4A1装配较重的枪管，以减低全自动开火时所产生的热量，并且加厚铝质隔热层。全数M4及M4A1均使用5.56毫米口径的SS109子弹，而且仍采用M16特有的气体直推传动方式。该枪是一款真正的卡宾枪，是采用了伸缩式枪托的M16A2短枪管型，可将其看作介于标准步枪和超短突击队员之间的中间型号。其大部分机械部件与M16A2通用，可使用M16和北约STANAG4179弹匣。

